

美国研究型大学探索译丛

主编 张斌贤
副主编 王晨

罗伯特·M.罗森兹威格 著
Edited by Robert M. Rosenzweig

王晨 译
林薇 校

**The Political University:
Policy, Politics, and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in the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y**

大学与政治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政策、政治和校长领导

河北大学出版社
Hebei University Press

《美国研究型大学探索译丛》

主 编：张斌贤

副主编：王 晨

河北大学出版社

大学与政治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政策、政治和校长领导

罗伯特·M. 罗森兹威格 著

王 晨 译

林 薇 校

The Political University: Policy, Politics, and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in the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y

by Robert M. Rosenzweig

河北大学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责任编辑:何屹

电话:0312-5921813

Email:heyi2817@sina.com

冀图登字:03-2004-012

©1998 Robert M. Rosenzweig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Marylan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Hebei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与政治: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政策、政治和校长领导/张斌贤主编;王晨译.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8.1

(美国研究型大学探索译丛)

ISBN 978-7-81097-225-3

I. 大… II. ①张…②王… III. 高等学校—教育政策—研究—美国 IV. G649.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0473 号

封面设计:王占梅

责任印制:闻利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五四东路 180 号)

印制: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张:15.5 字数:232 千字

规格:1/16(787mm×960mm)

版次:2008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2 月第 1 次

ISBN 978-7-81097-225-3

定价:32.00 元

在随后的几年里,纽曼如同一个独自行走在沼泽中的人,面对巨大的困难,孤立无援,顽强斗争。他那本来应该在想象和哲学的空间中遨游的心智,现在为一些微小的细节所纠缠,他以例行公事和妥协为生。他迫使自己去聚敛钱财,为学生报纸撰写文章,为医学实验室拟订计划,并逢迎市议会;他不得不与特派员牧师和粗野的小地主一起,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走遍爱尔兰的偏僻地区。他就像一匹被迫套上马具、去拉四轮马车的纯种良马;而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维多利亚时代四名人传》
描述了纽曼在爱尔兰致力于创办一所学院时的生活

议会的先生们:我现在就走;我决不会再踏入这个城市半步。你们就像往常所做的那样,无礼地拒绝了给予大学哪怕是一美元的拨款。我期待着、并且清楚地预见到一个时刻的到来,那时,比你们更好的人将会坐在你们现在的位子上,而这些人现在就在我的大学里。

——亨利·菲利浦·塔潘(Henry Phillip Tappan)
密歇根大学校长,1852~1863

目录

总序.....	(1)
致谢.....	(1)
前言.....	(2)
第 1 章 战后.....	(1)
第 2 章 华盛顿 1983	(19)
第 3 章 规则变化.....	(39)
第 4 章 规则变化(续).....	(80)
第 5 章 面对未来.....	(105)
第 6 章 面对未来(续).....	(133)
第 7 章 对领导能力的挑战.....	(168)
后记.....	(188)

总序

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卡内基基金会在其《高等教育机构分类》(A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1973)中提出的。制定这个分类的初衷是“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出于确信有必要创立一个能够鉴别大学的不同职能类型,并使其差别合法化的新的分类体系”。^①这个分类为当时美国 2800 多所高等教育机构设计了一个多样化的分类体系,即把高等教育机构分为博士学位授予大学(Doctorate-granting institutions)、综合性大学和学院(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s)、两年制学院(Two-year colleges)和专门学院(Specialized institutions)等五大类。在博士学位授予大学中,又按照每年从联邦获得科研经费和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分为研究型大学 I 类、研究型大学 II 类和博士学位授予大学 I 类和博士学位授予大学 II 类。^②

根据卡内基基金会《高等教育机构分类》(1973 年),在当时全美 2837 所高等教育机构中,五大类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布是:

机构类型	数量	占全部高等教育机构的比例(%)
博士学位授予大学	173	6.1
研究型大学 I 类	52	1.8
研究型大学 II 类	40	1.4
博士学位授予大学 I 类	53	1.9
博士学位授予大学 II 类	28	1.0
综合性大学和学院	456	16.1
文理学院	721	25.4
两年制学院	1063	37.5
专门学院	424	14.9
总计	2837	100

这个分类经历了 1976 年、1987 年、1994 年和 2000 年四次较大的修改,并计划于 2005 年再进行修改。^⑤目前使用的是 2000 年的分类。这个分类与 1973 年的分类有了较大的变化。2000 年的《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把高等教育机构分为 6 大类,即:博士学位授予大学——研究型大学(Doctoral/Research Universities)、硕士学位授予学院与大学(Master'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学士学位授予学院(Baccalaureate Colleges)、副学士学位授予学院(Associate's Colleges)、专门学院(Specialized Institutions)和部落学院与大学(Trib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其中,在博士学位授予大学——研究型大学中,根据授予博士学位的范围,又分为“广泛型”(Doctoral/Research Universities-Extensive)和“集中型”(Doctoral/Research Universities-Intensive)两类,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每年在不少于 15 个学科授予不少于 50 个博士学位,而后者每年在 3 个或更多的学科至少授予 10 个博士学位,或每年一共至少授予 20 个博士学位。在其余四大类(部落学院和大学除外)机构中,又根据学科的不同细分为不同的类型。

根据卡内基基金会《高等教育机构分类》(2000 年),在全美 3941 所高等教育机构中,六大类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布是:

机构类型	数量	占全部高等教育机构的比例(%)
博士学位授予—研究型大学	261	6.6
“广泛型”	151	3.8
“集中型”	110	2.8
硕士学位授予学院与大学	611	15.5
学士学位授予学院	606	15.4
副学士学位授予学院	1669	42.3
专门学院	766	19.4
部落学院与大学	28	0.7
总计	3941	100

自1998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讲话发表以来,“世界一流大学”、“世界高水平大学”和“研究型大学”,逐渐成为国内高等教育界普遍使用、且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关键词”。根据粗略统计,在我国1000多所高等院校中,至少200所院校在其发展目标或战略规划中,使用了“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或“教学—研究型”之类的字样。

同样,在有关高等教育的研究中,研究型大学概念出现的频率也不断增大。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等文献资源库上进行的调查显示,自1998~2004年,国内学者先后发表的有关研究型大学的论文超过了398篇。

应当说,在我国高等教育近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中,很少有一个直接来自国外的名词或术语会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成为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乃至影响我们对高等教育思考的“大观念”。

那么,我们(无论是高等教育机构的领导人还是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究竟对这个如此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思维和行为的观念以及这个观念所包含的意义,是如何认识的?我们的认识达到了何种程度?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时髦的概念,一个流行的名词,还是在真正理解了它的本义之后形成的自觉意识,并在这种意识指导下制定相应的战略和规划?

在更为深刻的层次上,对于研究型大学建设的思考与规划,不仅涉及一所大学自身的发展战略,而且事关一国高等教育的宏观布局结构和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毋庸置疑,中国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

展,需要有一大批具有高质量的研究型大学提供智力和人力的支持;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也为建设一批研究型大学创造了客观条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究竟有多少所高等院校已经基本具备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条件?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能提供多少众多研究型大学所需要的高质量的学生和教师资源?我国的国力究竟能支撑多少所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

另一方面,既然“研究型大学”的概念(无论是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分类还是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定位)直接来自于美国,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相当部分高校发展的“样板”,那么,就有必要广泛和深入地了解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分类的由来,更主要地,是要把握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过去是如何发展的、现在又面临哪些问题以及未来可能的走向。只有这样,研究型大学才不会只成为一个概念或流行的词汇。

我以为,如同高等教育中出现的种种现象一样,一哄而起的建设研究型大学“热”,实际上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界目前虚假繁荣和浮夸躁动的表征之一。作为学者,是难以凭借个人之力改变这种现实的(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但至少可以通过自己的学术工作为改变现实提供一些依据和工具。这是我和我的学生们近几年来之所以致力于大学史研究和编译(《美国研究型大学探索译丛》是整体工作的一个部分)的主要出发点和目的。我们希望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至少能为我们的读者带来一些启发,以拓展和加深对现代大学和研究型大学本质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在实践中减少一些盲目者、盲从者和盲动者。

在《美国研究型大学探索译丛》(第一辑)即将与读者见面之际,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同事们(特别是王英杰教授)所给予的大力支持。王英杰教授对书目的确定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我感谢我的学生们。几年来,他们的热情和辛勤的劳动激励我锲而不舍地完成这项工作。在与他们的共同劳动中,我从他们身上获得了非常有意的教益。

我感谢蔡冠深先生、蔡制侯先生和新华教育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本译丛作为北京师范大学中美教育研究中心的一期研究成果,得到了新华教育基金会的积极支持。

我难以用言语表达我对河北大学出版社前社长宫敬才教授的谢意和敬意。他不仅把这套译丛列为该社“十五”的重大选题,而且不断支

持和督促我的工作。我深深感谢河北大学出版社的臧燕阳同志。三年来,他为联系版权等事务花费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劳动。

张斌贤

2007年1月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注释

①Hugh Graham and Nancy Diamond: *The Rise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Elit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Postwar Era*.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53.

②Carnegie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A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Berkeley, Calif.: Carnegie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1973.

③<http://www.carnegiefoundation.org/>

致谢

ix

我很幸运,我的一生都是与富有天赋的人一起共事,并互相支持。在斯坦福的 21 年里,我遇到了许多杰出的老师,如艾伯特·布克(Albert Bowker)、理查德·莱曼(Richard Lyman)、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詹姆士·西耶纳(James Siena)、约翰·施瓦兹(John Schwartz)、拉里·霍顿(Larry Horton)、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赫尔伯特·帕克(Herbert Packer)、威廉·克莱布什(William Clebsch),并聆听他们的教诲。我进入斯坦福的时候,适逢它正在成长为一所伟大的大学。有幸见证这个过程,并参与其中,是在现代大学中所受的最好教育。

同样地,我也很幸运与卡罗尔·舍曼(Carol Scheman)、杰克·克罗利(Jack Crowley)、约翰·沃恩(John Vaughn)、纽顿·卡特尔(Newton Cattell)、琼·金德瑞德(Joan Kindred)一起在美国大学联合会工作(之所以只提到他们,是因为最初我就与他们一起工作)。他们在与华盛顿打交道方面比我更睿智,他们的学识、智慧和友谊让我本来可能困难重重的工作变得轻松悠闲。我们也有不成功的计划,但大多数计划都是值得去做的,并且所有计划在做的过程中都充满乐趣。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首先要感谢各个大学的校长和前校长们,感谢他们的拨冗相见,感谢他们的坦率和信任,我希望我在书中没有辜负这些信任。密而生狎,但在与大学联合会的大学校长们的交往过程中,我却没有这样的感觉。毫无例外地,我们都成了同事,有许多

人还成了朋友。

我还要特别感谢纽约卡内基公司的大卫·汉姆伯格(David Hamburg)、芭芭拉·芬伯格(Barbara Finberg),我们在斯坦福时就已经是朋友,除此之外,他们还是最有耐心的资助者。

芭芭拉·凯伊·沃尔芬格(Barbara Kaye Wolfinger)给了我如何进行访谈的建议,但访谈结果应该由我负责。她,还有雷蒙德·沃尔芬格(Raymond Wolfinger)、芭芭拉·夏皮罗(Barbara Shapiro)、保罗·辛迪曼(Paul Sniderman)、唐纳德·肯尼迪都阅读了部分手稿,并提出了意见。但文责自负。优秀的出版商安德鲁·布劳纳(Andrew Blauner)在我困难的时候总是显得那么乐观,而杰奎琳·惠穆勒(Jacqueline WehMueller)对本书的编辑确保了重点明晰。

如果没有我妻子的帮助和支持,我的后半生可能一事无成。她具有非凡的勇气和创造力,并有着非常敏锐的感觉,她不止一次地指出我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方向。

这是一本写给年轻人的书。我的儿女凯瑟琳(Kathryn)和大卫(David),他们这一代已经从那些伟大的大学获益。当他们开始在美国的生活中承担责任时,他们所做出的决定将会影响他们的孩子是不是也将享有同样的幸运。我们有各种理由相信他们会经受考验。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本书是为了利亚(Leah)和莎拉(Sarah)所写的,他们的未来非常重要,他们未来生活的质量取决于我们书中所讨论的机构。他们现在还太小,不能明白,但我希望在他们懂事的时候,能够理解和思考我们所做的努力。

前言

xi

1991年夏天,我和约瑟夫·达菲(Joseph Duffey),(他那时是美利坚大学的校长),坐在横穿布鲁塞尔城的公共汽车上,讨论着一个大多数大学校长都关心的话题:其他大学校长的命运。最近几年来,在我们身上发生的这些不寻常的事情是值得记录和借鉴的。许多20世纪80年代在任的著名大学的出色校长在20世纪80年代末都已经离任。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撰写自己在任时的经历。但对我们来说,如果要想了解这些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院校现在被领向何处,那么,作为经历了美国大学史上关键十年的主要院校的领导者,他们的集体经验是一种独特的资源。

当公共汽车到站的时候,我们同意,通过访谈这个团体中的每一位成员,去试图获得这些资源;然后,组织一个论坛,让他们一起讨论在单独访谈中形成的问题。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想法并没有完全付诸实施。达菲成了美国信息中心的主任,计算着每年校长的“流通率”。但是在纽约卡内基公司慷慨资助下,这项研究还是进行了下去。12名前校长接受了长时间的访谈:

哈佛大学的德里克·博克(Derek Bok)、纽约大学的约翰·布兰德马斯(John Brademas)、加州大学的大卫·加德纳(David Gardner)、芝加哥大学的汉纳·格雷(Hanna Gray)、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格雷(Paul Gray)、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谢尔登·哈克尼(Sheldon Hackney)、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I·马歇尔·海曼(I. Michael Heyman)、斯坦福大学的唐纳德·肯尼迪、约彻·霍普金斯大学的斯蒂芬·马勒(Steven Muller)、耶鲁大学的本诺·施密特(Benno Schmidt)、哥伦比亚大学的马歇尔·索文(Michael Sovern)和马里兰大学的约翰·托尔(John Toll)。

xii 1995年4月26日,曾接受访谈的前校长中的8位,齐聚华盛顿,参加了为期一天的“美国研究型大学:延续和变革”的论坛。^① 他们与8位现任大学校长和一些杰出的观察家一起,就一些观点进行了积极有效的讨论。^②

论坛以及访谈的参与者都得到了匿名的允诺。很显然,我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使讨论变得充分和开放。这是一个折中的办法,但我确信这一次这个办法是正确的。所有的对话都很坦率,并且比以往更有价值。

书一旦开始写作,就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本书也不例外。开始时,它试图理解那些重要参与者的经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个性化。但最后,它主要有三个来源:访谈,论坛和我的经历。我先是在斯坦福大学,然后在1983年到1992年成为美国大学联合会的主席。^③ 美国大学联合会总部位于华盛顿,它代表了美国主要公立和私立研究型大学的共同利益,被认为是大学对全国研究政策和博士学位教育政策发表意见的首要渠道。同时,它也是20世纪80年代有关此类主题政策辩论的积极参与者。联合会成员大学在联合会的代表是它们的校长,因此,联合会有一种非比寻常的优势,通过它能够统观全国的研究型大学、它们的校长(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以及当时争论的主要问题。这些争论的问题以及大学对它们进行处理的能力构成了本书的核心。

① 这8位是约翰·布兰德马斯,保罗·格雷,谢尔登·哈克尼,马歇尔·海曼,唐纳德·肯尼迪,本诺·施密特,马歇尔·索文和约翰·托尔。

② 参加这次论坛的校长有:科罗拉多大学的朱迪思·阿尔比诺(Judith Albino)、印地安那大学的迈尔斯·布兰德(Miles Brand)、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威廉·格雷纳(William Greiner)、伊利诺斯大学的斯坦利·伊肯伯里(Stanley Ikenberry)、图兰大学的爱蒙·科里(Eamon Kelly)、多伦多大学的J.罗伯特·S.普里查德(J. Robert S. Prichard)、南加州大学的斯蒂芬·桑普尔(Steven Sample)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查尔斯·杨(Charles Young)。

③ 在斯坦福的21年里,我担任过各种职位,包括学术和行政上的,从研究生院的副院长开始,到教务长,最后到负责公共关系的副校长。

我很有幸能成为当时政治活动和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并对其实质内容和过程进行了观察。当然,在此显现的观点和我做出的结论,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我自己的经验成分。

另外有两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本书讨论什么和不讨论什么。指出第一点的是我的好朋友,本书手稿的阅读者之一芭芭拉·夏皮罗教授,她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并且对大学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独到的见解。她说:“你所描写的研究型大学,我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时曾了解过,但那并不是我在其中生活和工作了二十多年的研究型大学。你讲述的是理工科大学(the science university)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绝大部分观念来自华盛顿,大部分来自校长们。在关注科学和它们推动大学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时,你的观点有可能是正确的,但看起来好像其中并不存在人文学科和大多数社会科学。一个人从中得出的印象可能是,如果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从研究型大学中剥离,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变化。”

xiii

她指出了一个真正的两难问题。每一所研究型大学的构成都非常复杂,而对它们的考察也有许多角度。近年来,众多的批评家从人文学科教学与研究的发展来审视大学,在我看来,他们制造了一幅扭曲的图像。另一些人通过大学的社会政策来审视大学——因为肯定行动,或在南非的投资,或是其他理由,他们视大学为外部力量(通常是有害的)的一种工具。这两种方式,以及其他方式,只要它们不是全然错误的,都具有一些价值,都有可借鉴的地方。本书主要是站在公共政策的角度来审视大学,包括科学政策、税收政策、财政援助政策和调控政策,这些以及其他政策以一种深刻的方式塑造了现代大学。在对政府政策敏感的教育要素中,研究型大学是独特的。理解这些政策怎样出台以及如何影响大学,对于理解大学的发展是绝对必要的。公共政策不是现代大学的全部,但不能否认它是现代大学重要的一部分——即使不是最重要的。

这一点在现代大学校长的工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毫不夸张,在二战前,一所主要大学的校长,从早晨到达办公室到黄昏离开期间,完全不用考虑联邦政府。但对今日的校长来说,这样的日子实际上为数甚少。研究政策和资金、学生资助、人事政策、工作场所安全、环保危害、动物保护、人文学科保护(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这个

单子还能继续开下去,而其中每一项都是 20 世纪后半期的产物。

xiv

必须澄清的第二点是,这不是一本关于美国高等教育的书。近来众多畅销的高等教育著作都不那么令人满意,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没有考虑到我们学院和大学的多样化以及因此而造成的概括它们的难度。1800 多所社区学院和四年制的自由教育学院,在目的和方式上充满了差异。它们又与自称为大学的机构存在差异;在后者中,仅有少数能被归为真正的研究型大学——研究、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由同样的教师团体在同样的地点进行。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都很重要。但本书关注的焦点是最后这一部分——研究型大学,它们总共可能只有 100 所。

尽管与 3500 所中学后教育机构相比,研究型大学的数量很少,但是它们的影响和重要性却远远超出它们的数量百分比。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进行着国家大多数的基础研究,还因为它们培养了绝大多数未来的学院教师、各类科学家和学术性职业的领导者。它们在所有教育机构中是最突出的;而且,无论它们中发生的变革有什么背景和意义,这些变革都是国内外许多其他机构努力仿效的典范。为此,本书将它们从各类教育机构中挑选出来作为自己的主题。

无论我们选择何种角度,有一点是很明确的,20 世纪后半叶对于美国大学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期。美国大学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伟大的英国和欧陆大学的余荫下兴盛起来,获得了不容置疑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 and 世界上最好的学生都希望在那里接受研究生教育。实现这种转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本书就将讨论一些例子,它们是大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能预见或正视的问题。研究欺诈问题和相关的利益冲突问题就是其中的两个。而且,在转变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是朝向好的方向。本科教育和研究之间的天平,在早些时期严重向前者倾斜,而随着研究带来的金钱和声誉的增长,天平开始倾向另一端,无论是教师还是大学都是如此。值得重申的是,此间的中心问题是联邦政府及其政策。如果不理解政府政策的深刻影响,不理解大学为其自身目的试图去影响政策方式,就不能理解现代大学的过去、现在和
xv

理解过去有助于在对未来的希冀中更好地理解现在。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20 世纪 80 年代是一个重要时期,它们放弃了多年来因循的